

第一章 导言

中国近现代史是近现代中国的国史，主要记述和探讨自1800年以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今天为止从全局上对中华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前途有重要影响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首先宜确立以下观念，即：一、历史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近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观念，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三、近现代史的主题是建设现代国家。现分述如下。

第一章 导言 中国近现代史述要一、历史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宗教中寻求人生归宿的传统不同，中国文化很早就已经觉悟到，人是历史的动物，人生于历史之中，长于历史之中，创造于历史之中，最后又归于历史之中。唯其有史，人才成其为人；唯其有史，人才能够年积代累，起点一代更比一代高，境界一代更比一代美；唯其有史，立功、立言、立德者，为国家、民族发展做出重大发明创造和贡献、牺牲者，以及大奸大恶、为害国家民族者，才得以记录在案，昭示警醒后人，激励来者。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之所以敢于敞开胸怀，大胆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在长长的历史序列中所处的位置和使命，不仅要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而且更要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一个生物体的、茫然的“小我”及其有限的生命，凝聚成无穷的、历史的、有意义的“大我”。李大钊在《史观》一文中曾说：“人类的历史，果自何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三卷，第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因此，历史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管子·》、“不知来，视诸往”《春秋繁露·》、“述往事，思来者”《六臣注文选·》的传统，一部《春秋》，其“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春秋繁露·》一代代良史不计个人得失和生命安危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就其“一家之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屡遭危难而不亡反兴，延续数千年而不断，在世界史上大放异彩，其密码正在于此。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总结说：“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著，王佩铮校：《龚自珍全集》，第21页、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因此，他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龚自珍著，王佩铮校：《龚自珍全集》，第81页。

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在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也常常从“历史”开始，或者把他们欲侵略的那些非欧美国家和民族说成是“停滞的”、“没有历史的民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老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的客观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第110页，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或者把他们打入“历史”的另册之中，把他们描绘成

“野蛮的”、“未开化”或“半开化的”、“传统的”而“非现代的”民族，以便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披上“文明的”、“现代的”的“合法”的外衣，给自己本来极不人道、极不光彩的行为赋予一种“启蒙”、“解放”的光彩。

近代以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中国国势衰落，有志之士群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度、文化，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应继续虚心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在历史领域，这些失误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误以为西方的历史、历史理论、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著作都是绝对科学的、客观的、学术化的；二是误把中国固有的历史、历史理论、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著作都当成是封建的、落后的、非科学的、过时的东西。显然，这类糊涂认识与现今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3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大国，光有经济上GDP的提高是远远不够的。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正在往小康迈进。相对而言，我国文化建设虽然也取得巨大成就，但总体水平和总体实力同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不相适应，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相适应，同改革开放的形势要求不相适应，同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进入新世纪，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支撑，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二是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独立的贸易形态，在国际竞争中走向国际前台，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三是文化领域已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战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为广泛，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战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有效抵御外来思想文化渗透，就必须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不仅仅是著名导演执导出的高票房的大片和名流所写的畅销书，文化软实力更是内化在每个国民身心中的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历史作为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仅是知识和学术问题，它是中华民族综合国力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历史安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安全，历史教育是否成功，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伟大的历史性的复兴。当代青年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人，担负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伟大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学好历史，尤其是学好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知中华民族是如何一步步从辉煌的古代走到多灾多难的近代，并最终觉醒、奋起，走上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

二、“近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观念，而是有其特定的内容

从词源来看，“近代”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已存在，它与“古代”和“昭代”等词相对应，指的是离说话者所在的“昭代”，即当代距离较近，而介乎于古代和当代之间的一段历史。从晚清开始，该词被用来翻译西文的modern等词。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该词渐成为新兴的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专门学科的代名词，即“中国近代史”。“现代”一词在英文中本与“近代”是同一词，即modern，但在中文中，它却常常被用来指五

四运动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历史时期,现在也有学者拿它来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古代”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繁衍、融聚、奋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光荣历史,虽偶尔也涉及到周边国家和民族,但范围始终十分有限,亚洲以外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虽对中国也有所影响,但程度有限。

“近现代”则与此不同。近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与古代极不相同的内涵。

首先,“近现代”是世界性的,是全球化的。吕思勉著《中国近代史讲义》认为,中国近代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政变起,迄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吕著中国近代史》,第 4 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郑鹤声《中国近代史》:“我国近世史之开端,自新航路之发现始”,“自新航路之发见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以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具体到中国而然,近世史则“上自明代,下迄今兹,包罗近三四百年之事实”。(郑鹤声著:《中国近代史》,前编第一分册编纂凡例,南方印书馆,1944 年 10 月。)新的海上航路的发现和全球性商贸网络的建立以及西方列强在此过程中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侵略扩张活动将从前相对孤立的世界连为一体。面对着撞关破门而来的列强,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逐步开始认识到,中国只是“列国并争”的世界诸国中的一国康有为等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经常用“列国并争”之类的字眼来形容当时的时代。1895 年 6 月 30 日《上清帝第四书》:“今通商既开,列国环逼,既已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不能谋其军法兵谋,无以为用兵应敌”,“夫泰西诸国之相通,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法治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法治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中国处此大变动时代,“当以开创治天下,不当以守成治天下;以列国并争治天下,不当以一统无为治天下。”1898 年 6 月《请告天宜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一统闭关之治,与列国竞争之治,若冬夏冰炭之相反、水陆舟车之相异也。今我国处竞争之新世,而行闭关之旧法,安得不危败乎?”1898 年 6 月 8 日徐致靖拟《请明定国是疏》:“当诸国并立之时,万不能复守秦汉以后一统闭关之旧”。1898 年 6 月 17 日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所谓变国是者,在正明中国之在大地为数十国中之一国,非复汉、唐、宋、明大一统之时,其为治,当用诸国并立流通比较之法,不能用分毫一统闭关卧治之旧”。(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 149 页、152 页、第 256 页、第 258 页、第 26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在此时代,中国内政“一切无不牵及外交”。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第 56 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在此时代,“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问题”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 年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语。因此,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讨生活”语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蒋在此书中说:“到了 19 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蒋廷黻,沈渭滨导读:《中国近代史》,第 9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不仅中国各省地方都受其冲击例如,1919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曾形象地描述说:“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

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教育”。 “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民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各行各业蒙其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罗家伦先生曾经评论道：“中国和西洋的接触，并不从最近开始，但是在最近一段里，中国确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许多国际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影响。不只是军事、经济和所谓一切物质文明，因此发展了新的局势，而且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也因此受了剧烈的震动和变更。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要研究中国政治的改革和变动，非打通国际的情形来看不可；要研究社会的改变和生活，非综合他国的现象来看不可；要研究文化的演进，非考察世界的学术思想不可。”“近代史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人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他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第137页、136页，1931年3月.），而且整个中国革命也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较早明确提出此观点的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等。1925年8月，李大钊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中提出：“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再进一步言之，即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世界之问题也。帝国主义已至一定程度，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之一日，即世界问题解决之一日，即世界革命成功之一日。”次年5月，他在《政治生活》第76期上发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在介绍了马克思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评论后指出：“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的，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一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5册，第48页、第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轻的毛泽东也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联系。有关此点，参见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2页.。

其次，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上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欧洲资产阶级经过两三百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战胜封建主义，在欧洲确立了自己的统治。这一制度以议会民主政治为躯壳，以资本为灵魂，通过血与火等残酷手段，无情地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冲突日渐突出，也由于与资产阶级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逐步成长壮大，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同的社会主义式的人民共和国的方案越来越成为饱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选择。

再次，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如上世纪30年代的学者所评论的那样：“近代世界文化有两种重要的特别：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大规模的民治，兼领数洲的大殖民帝国，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斗争，支配世界市场的大公司等。上次（指第一次--编者）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的

文化发展，似乎有共同的趋势：素不行政治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俄罗斯都像望着民治走，未曾使用机械的国家，也步步的踏入工业革命的园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苏联等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立场“虽一个站在北极，一个站在南极”，但“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谁都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尚未闻有革命之声。左派的，右派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男的，女的，白种，黄种，老年，幼年，没有一个肯树反自然科学和反机械工业的旗帜。所以我们如说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没有人反对的。这种科学机械文化发源于欧洲西部，近代史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史，欧西以外的国家都是被这种文化征服了。抵抗这种文化的国家不是被西欧占领了，化为殖民地了，就是因战争失败而觉悟，而自动地接受这种文化，胜利的抵抗是没有的，能利用这种文化来生产，来防守国土者就生存，不能者便灭亡。这是近代史中的铁律，没有一个民族能违犯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蒋廷黻选集》，第四册，第637~638页，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社，1965。

近现代的这些特点，是我们研究和探讨中国近现代史时不能不时时加以注意的。换言之，我们要想深入了解和更好地认识近现代的中国，就必须充分注意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与互动，关注此种关联与互动的潮流与方向。

三、 近现代历史的主题是建设现代国家

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大学正式开设的课程，最早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关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基本过程及整体情况，参见张海鹏、龚云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以罗家伦、蒋廷黻为代表的“近（现）代化”派和以李鼎声、范文澜、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反侵略派”。两派虽然在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一点上是大体相同的，但对于整个近代历史发展的认识框架及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等却存在着很大分歧。一般说来，“近（现）代化”派把“近（现）代化”看成近代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中国只要能够学习西方，实现近（现）代化，中华民族就能复兴。这方面，蒋廷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总论》中指出：“到了19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19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蒋廷黻，沈渭滨导读：《中国近代史》，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又说：“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都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同上书，第15~16页）“反侵略”派则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

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只有彻底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派，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统一、人民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序言》，1946年。

“研究近代史，就是为了提醒人民，警惕帝国主义会利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可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六版序言。这一派要证明的重点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初版序言。

两派学者在当时所进行的近代史研究及进行此种研究时所运用的思想框架和提出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为服务于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进行的，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立场。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历史也已经对两个派别的近代史主张做出了某种结论：坚持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支持，建立了新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围绕着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到底是革命还是近（现）代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讨论可参见刘大年：《方法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近代史研究所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第136~147页（第一章《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评价和方法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2月14日；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龚书铎：《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华魂》，2006年第3期；冯钢：《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王旭东、黎俊祥：《以现代化为主线略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井建斌：《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5期；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他们的研究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深化了我们对于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研究从总体上看，注重了历史的某一层面或某些层面，而对近代历史的主题或母题则缺少全面、总体的把握。而讨论中所用“近（现）代化”等术语本身含义的不确定性 这方面，“近（现）代化”一词表现最为突出。在中文中，该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主要指工业化，即经济生产领域中利用现代机器生产代替传统的手工或半手工生产。30年多年，即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在冷战的高潮中，欧美学者用现代来指“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用传统来“落后”的非西方社会，认为如果非西方社会要摆脱传统、进入现代，就必须学习西方，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使“现代化”一词等同于“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从而使该词具有了强烈的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将该词拿来讨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但在使用该词时，各家往往各取所需，“现代化”一词的含义也就更加模糊。不仅会时常引起论争，而且也确有一些殖民主义者利用这些术语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例如，一位研究德国现代化的学者就曾援引德国海军军方的文件，对德军1897-1914年占领中国青岛并在此实行殖民统治的行为作如下辩护：“把工业引入青岛地区，这使中国居民获益匪浅；……对

于帝国海军当局来说，铁路、技术转让、基础设施建设比获得某些实惠更重要。凡此种足以驳斥那种认为海军是怀着剥削、掠夺的殖民主义动机到胶州的观点。”（余凯思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第12页，孙立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而这类“现代化”主导的研究造成的情况是：“简化为现代化的进步在殖民化中有其秘密范式：一个被传统所阻塞的发展的领域陷入了市场的和受市场制约的国家行政管理的漩涡。这种把进步与现代化等同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所有反对它的政治抵抗--不论是殖民地人民起义、农民暴动、纺织起义还是平民主义斗争--都可以被记作‘反现代主义的抗议’而受到指责。”（余凯思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译，第13~14页）。这些都妨碍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在近现代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一方面必须革外国帝国主义和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学习西方，实现中国的近（现）代化。但是，在这两重任务中，革命不是为了革命，近（现）代化也不是为了近（现）代化，革命和近（现）代化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最高目标，那就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换言之，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而革命与近（现）代化则是完成这一主题的两大重要手段。

建设现代国家，一般简称为“建国”，并不是简单地指创建一个全新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建国”指的是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或建设一个对外拥有独立自主权、内部社会秩序良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人民不仅需要尽其应尽的义务而且还享有各种应该享有的权利，从而能够安居乐业的国家。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就感到：“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近代文献丛刊），第4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如何在强国如林的近代世界中“自立于天下”而不为“天下万国所鱼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近代文献丛刊），第51页。的问题，就日益迫切地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以清廷为中心，一边节节抵抗列强的侵略，一边尝试对内政外交的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并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机械化生产及相关制度，发起以国防建设为主、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实事求是地说，清朝皇室及政府在主观上无疑是很希望中国能够像西方列强一样强大，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的体面和尊严，为此，他们不仅采用西方近代先进的机器生产及相关制度，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双管齐下，既在国内设立新式学堂，又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以培养中国自己的专门技术人才，甚至连光绪皇帝也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开始学习英文，研究西学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等都报道过光绪皇帝学英语的消息。李鸿章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十三日写给其子李经方的信中亦曾称：“皇上去冬传同文馆学生入内教洋文（奉太后命，诸臣皆不谓然），闻已熟四拼字。”（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第96页）；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对光绪学英文一事亦曾有过详细描述，说光绪皇帝从1892年前后开始学习英文，每天凌晨4点准时开始，而负责教光绪的老师则要半夜起床赶至皇宫等。（Martin, W. A. P.: A Cycle of Cathay, 原书出版于1896年，今据首尔：韩国景仁文化社出版，2000年版，第340~341页），但由于其内部的不统一和国策的不明朗，由于对外的一贯妥协退让，对内尤其是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其努力收效甚微，不仅不能有效抵抗列强的侵略、挽救国家的危亡，反而日益将国家推到灭亡的边缘。甲午战争以后，仁人志士痛感于“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聚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钳制家奴

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知非颠覆满洲，无由改造中国”，乃从革命和立宪两条思路发起了“建国”的运动。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先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等团体，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而“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颠覆满洲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国家，以屹然于世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1986年第二次印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共和政治的条件，甚至连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的条件也不具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只有在保持清朝政府统治的大框架下，先以开明专制作预备，然后再逐步过渡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详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一号~第五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之所以高举革命旗帜，其最高目标亦是要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辞》中提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更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长期奋斗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指出，近代中国人民学习西方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后来十月革命后改学俄罗斯，也是因为俄国人民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9~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中国人民在建立自己的现代国家之前，之所以首先需要进行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是因为中国人民喜欢革命，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人民建立自己的现代国家，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极力阻止中国人民建立自己的现代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

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0页。如果一旦中国人民经过革命之后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国家，现代化事业将获得迅速发展，就会出现中国与世界双赢的局面。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提到：“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日本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外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不仅如此，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革命与现代化都是建国的重要手段，都不可缺少。二者之间虽在特定时期内所占位置和重要性并不总是完全相等，而是有所轻重，但却绝不是前后相续、完成一件之后再去做另一件，而是同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两者互相配合，才能相得益彰：革命可以为现代化事业开辟道路，而现代化则为革命事业提供物质上的支持，而无论独立也好，还是现代化也好，都是现代国家所不可缺少的要素，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1944年4月3日，毛泽东在修改任弼时起草的一份文件时，加上了如下文字：“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外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册，第125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就包括了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内。

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题为《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讲话，指出：“现在无论中国和外国都在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区在五年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产业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个工人，到了今年就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在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会，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一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46~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总之，近代中国的

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但是，为什么大目标相同的政治势力，最终的结局却不尽相同，有的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便被历史抛弃，有的则在一度取得辉煌的成绩、做出巨大历史贡献之后，迅速沉沦，走向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有的则历经挫折和磨难，最终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要求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让我们回到近代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国家的建国进程之中去吧。第二章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思考题

1. 中英之间发生鸦片战争的根源是什么？
2.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3. 洋务运动采取了哪些重要措施来应对变局？它最终为什么没有能把中国引向近代化之路？
4. 李鸿章等近代历史人物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指什么而言？

第二章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近现代史述要一、 康雍乾盛世及其失误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新兴的清王朝入关之初，朝气蓬勃，尤其是第二任皇帝康熙（1662-1721年在位）继位以后，先后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粉碎准噶尔上层分子的分裂企图，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此后，康熙又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其后继者雍正皇帝（1722-1735年在位）又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取消人丁税，使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一百多年，到18世纪中叶，即从顺治皇帝，中经康熙、雍正，到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时，经济日趋繁荣，社会日趋稳定，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储备不断增长，史称“康雍乾盛世”，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颇受人瞩目的强大而文明的国家。有关18世纪中国社会状况，可参见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9卷本），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应该说，清王朝在完成统一和恢复与发展经济方面确实有突出表现，但对于盛世之间出现的新问题，反应却不够灵敏，甚至可以说颇为游移不定，麻木不仁。这些新问题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内部迅速膨胀的人口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二是外部世界一体化的初步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压力。这两大问题成为18世纪末以来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

首先是人口问题。从有正式户口统计的汉朝开始，直到明朝末年，中国人口始终徘徊在2000万至6000万之间。详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第4~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据人口学专家估计，这些统计数字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实际的人口数字要少，但大体可以反映历代人口变化的一般趋势。清朝入关之初，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统计数字一度有大幅度的下降，但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特别是“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等政策的实施，这种趋势很快得以改变，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据记载，康熙末年全国共有人口2538万，至乾隆末年，人口已达29700多万，“人口增殖，较之康熙末年，殆多至十倍以上”。印鸾章：《清鉴》，第490页，北京，中国书店，1985。实际的数字虽未必如此悬殊据孙毓棠先生等研究，清初人口（1661年）大约为95688260人，1721年（康熙六十年）大约为123612120人。（详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但增长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乾隆以后，这种增长的势头仍然不减，至道光十四年（1834），全国人口总数已突破4亿，达到412814828人。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

人口的大幅增长一方面说明清朝政府的政策适合了社会的需要，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保证了社会的繁荣稳定，为人民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但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业及自然资源等带来巨大压力。尽管国外高产农作物新品种如美洲玉米、红薯等的陆续引进并大面积推广关于美洲农作物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参见全汉升：《美

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载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下册，第701~702页，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压力，但这一问题仍困扰着清朝统治者，乾隆皇帝就常常感叹“民愈庶，富愈难”，因此而“焦劳宵旰，每怀尧舜犹病之忧”。《清实录》，第16册，第686页，乾隆朝第599卷，乾隆二十四年十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人口膨胀消解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使身处盛世的人大多数生活于贫困状态之中，而朝廷遵循着轻徭薄赋的传统和信守自己所颁布的“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诺言，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增加，不仅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的建设，而且连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致使收受贿赂成为官员补贴生活的主要手段之一，官场腐败由此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政治的一大痼疾。

清王朝建立以后所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世界一体化及其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古代中国繁荣强大，在地理和历史知识所及的范围内，几乎没有碰到过强大的对手，在统一王朝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情况尤其如此。盛世的帝王没有横向竞争的对手，只能纵向竞争，与前代帝王一比高下。秦统一之后，议帝号，大臣们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始皇本纪》）。武则天做了大周皇帝后，自称“越古金轮神圣皇帝”。（《唐书·武则天传》）宋代程伊川讲宋代成就：“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内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河南程氏遗书》卷15）吕大防告诉宋哲宗，与前代相比，宋代有七事超越前代：“一，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二，前代宫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三，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五族皆不预，此待外戚之法也。四，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五，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廷，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六，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七，前代多深于用刑；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宋史·吕大防传）明朝董穀《碧里杂存》：“我朝超越前代者，略言七事，而一统之盛，尤自古之所无也。是故汉吕临朝，唐武易姓，赵宋虽多贤后，犹有垂帘之失；国家历九朝，椒房不预政事，内廷甚正，一也。外方之患，自汉以来，和亲致币，不知纪极；国家廓清致太之后，遂绝其源，大限甚明，二也。人君即位，谓之元年，无再元之理。其弊自汉文帝始，后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数元者，无谓之甚。我朝列圣相承，只以一元纪世，老成正大，无夸侈变更之心，三也。党锢之祸，汉以之亡，牛李蜀洛，何代无之；国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无复朋党，四也。古者名不偏讳，临文不讳，惟致谨于君上之前耳。后世忌避太甚，极为可恶，名晋肃而不举进士，姓石昂而改命右昂，片言只字，无心获罪者，不可胜举。我朝惟进御合避外，一切皆略之，士风稍古，五也。前代杀人无忌，虽平居杯酒之间，动以人命为戏，如王恺饮客，日杀美人；徐知诰鸩弟，贻祸伶者。其他快己欲，复私仇，虽当盛世，漫无法度。我圣祖在御，先除五刑酷法，后申《大诰》三篇，明著律令，使之趋避。故虽位极人臣，无敢专擅杀戮，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无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虽张禹大儒，后堂女乐，而谢安之风流，杜牧之狂狷，缙绅以为美谈。至于有宋，士习稍迁，而此风不变。我朝一革遂尽，始无寄猥之丑，七也。”明人陈继儒《狂夫之言》除此之外更列十事，以为超越前代：“前朝太学生皆上书，吾朝独生员不许陈民间利弊，一也。九镇以制府文臣为将，天子自为居宋，二也。阁臣部寺之长，与边腹大帅，外廷会推，内廷不得专擅，三也。母后不称制，四也。勋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讲官，即宫坊寮采，不立博望苑，不开天策府，六也。无殉葬，七也。不用黥刺别劓庵割之刑，臣下敢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决，八也。京师有热审，省直有减刑，非大古典不轻赦，九

也。宋制，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两人，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孙，孙又任其子，任侄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任子入监，纨绔子弟不滥朝籍，十也。然则定鼎卜历，尚可量哉！”清朝袁栋《书隐丛说》卷二：“余谓本朝超越前朝者八事：四圣相承，宽猛相济，帝德之隆，一也。台湾、青海，亦入版图，幅员之广，二也。椒房不预政事，母后无垂帘之失，三也。内竖止给洒扫，无宦官干政之嫌，四也。外戚不侈，五也。宰执无权，六也。即位改元不再元，康熙至六十一年，运数之绵，七也。外方平治，无和亲致币之事，御守之略，八也。”（以上引自杨联陞：《朝代间的比赛》，《国史探微》，第32~3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降至近代，形势突变，竞争主要不是来自前代帝王，而是横向来自欧美列强乃至仿习欧美列强而新起的日本。

当清朝上上下下为盛世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方，即西方，一批在古罗马的废墟上诞生的国家，逐渐摆脱教会统治，从停滞与混乱中走出来。经过千年冲突与苦难的磨砺，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不弃“文”尚“武”尚“商”，其中部分“新”兴势力更是抛弃一切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公开地、毫不掩饰地、不择手段地追逐着财富与势力，只要能够达到获取财富与势力的目的，走私贩毒、造假盗抢、贸易奴隶英国法律从1806年才开始禁止奴隶贸易；美国的奴隶制度则经过南北战争才被废除，都争先恐后而为之。在这一过程中，初步获得财富与地位的资产阶级，不满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压制，渐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反抗，以便从制度上确保其财富与地位。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发起革命，推翻封建政权，逐步确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前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等先后发生类似的革命或改革，从制度上确立起资产阶级在欧洲的统治或主导地位。他们利用国家机器，鼓励和保护资本，刺激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与之相应的发明创造（包括海外“探险”）开始受到专利保护，学术研究、产业制造、商业贸易、军事政治开始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此过程中，近代世界历史中两大互相联系同时又互相矛盾的潮流开始凸显出来：一是从前互不联系或联系较少的各地区被整合为西方支配下的一体化的世界，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空前加强；二是世界在被整合为整体的同时又分化为二，一是处于中心的、殖民的、侵略和掠夺的、日益富裕的资本主义列强，一是处于边缘的、被殖民的、被侵略和被掠夺的、日益贫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指的正是此种情形。

野心勃勃的欧洲不仅在自己家乡发财致富，他们还竞相跑往海外，武装“探险”，一路走来，所到之地，凡是欧洲人此前地理知识中所无的，或虽是欧洲人此前地理知识中所有，但因地处水陆战略要冲，辄占为己有。欧洲传教士也随之而来，在这些新“发现”的地方，一方面向殖民者提供宗教服务，另一方面则向当地原始居民传播“福音”。

随着世界上大多数陆地被“发现”完，没有更多的“新大陆”可供进一步的“探险”和“发现”，冒险家们开始向原来已知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探险”。于是，印度、中国及中亚和东南亚一大批国家和地区相继被西人“发现”。同时，商人和传教士也冲到了最前面，成为西方扩张的先锋队，紧随其后负责保护他们的是国王的军队，西方列强“每以商力裕其兵力，兵力佐其商力。商之所通，兵亦至焉。水师战舰，分布称雄，以是官以卫商，兵若卫官，似若有所恃而不恐。”王韬：《序》，查尔斯·马顿斯著：《星轺指掌》，联芳、庆常译，傅德元点校，第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学者们则为上述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有的，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论证大国占有殖民地合情合理，没有殖民地，大国不成其为大国，殖民地也无法摆脱“野蛮”而进入“文明”；有的，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则提出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来源，国家应大力保护；有的则论证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并最终发展成为后来有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